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文化教育编

第十五卷 (20—15)

文学艺术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北京

目 录

第十五卷

(一) 文学

- 记林琴南的几件事 吴家琮(1)
 我的诗和字 柳亚子(5)
 柳亚子在桂林 李白凤(7)
 同鲁迅先生来往的几点印象 ... 金 丁(15)
 “书虫”许地山轶事 周俟松(19)
 我的创作和生活 张恨水(22)
 达夫在闽轶事 钱履周(37)
 缅怀老友徐志摩和陆小曼 刘海粟(41)
 “剑三今何在?”——忆王
 统照 臧克家(46)
 追忆朱自清 陈竹隐(51)
 诗人于赓虞的一生 许凤才(61)
 我和邵洵美 盛佩玉(70)
 追忆先父傅雷 傅 敏(78)
 往事 萧 乾(85)
 我的前半生 姚雪垠(107)
 回忆我的姐姐萧红 张秀珂(126)
 走向文学之路 罗 荪(129)
 我的创作道路 草 明(133)
 少年时代的梦幻 陈荒煤(138)
 南社的创立与停顿 陆丹林(148)
 未名社的始末 李霁野(154)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东京的
 活动 陈子谷(159)

(二) 美术·书法

- 忆父亲吴昌硕 吴东迈(163)

- 回忆吴昌硕 刘海粟(165)
 忆白石老人 张次溪(167)
 我与齐白石的一段交往 吕宜园(184)
 国画大师黄宾虹 王伯敏(192)
 回忆老画家程瑶笙 郑逸梅(197)
 岭南革新派画家陈树人和高
 剑父 黎葛民 麦汉永(202)
 工笔花鸟画大师于非闇 胡絮青(214)
 人创造路,路召唤人 刘海粟(217)
 忆溥儒先生 王振中(226)
 我所知道的溥儒 唐明哲(231)
 好花时节不闲身——忆丰子
 恺先生 刘叶秋(235)
 父亲张大千的
 画业 萧建初 张心瑞(238)
 张大千敦煌行 张心智(242)
 求美的勇士 记潘张
 玉良 石 楠(263)
 我和《流民图》 蒋兆和(270)
 记关良 谷 苇(279)
 敦煌在召唤 常书鸿(291)
 艺海无涯苦作舟 吴作人(301)
 京华艺术生涯 李霞生(308)
 我与油画 李瑞年(313)
 我与木刻艺术 李 桦(320)
 初学木刻 刘 岷(322)
 我在重庆的木刻生活 王 琦(326)
 雕塑艺术生活漫忆 刘开渠(330)
 我的面塑生涯 郎绍安(350)
 记“湖社画会” 陈维麟(355)
 谈谈清末河南几位书家 杜慕堂(359)
 忆贺孔才先生 刘叶秋(361)

书法家麦华三·····	麦广达(364)
闻一多和他的篆刻·····	闻立鹏(367)
我的朋友邓散木·····	王逸如(372)
我与篆刻·····	刘淑度(374)

(三)音乐·舞蹈

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

友梅·····	廖辅叔(384)
我所认识的黄自·····	廖辅叔(391)
记作曲家刘雪庵·····	廖辅叔(402)
我学习音乐的经过·····	江定仙(406)
回忆和聂耳的一次合作	
演出·····	老忠诚(413)
我与音乐·····	喻宜萱(415)
饮誉乐坛六十年的马	
思聪·····	马思周 杨 永(422)
我和明月社·····	黎锦晖(430)
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领导的	
音乐宣传活动·····	林 路(461)
武汉合唱团赴东南亚的抗日	
救亡演出·····	郭戈奇(464)
国立音乐院的“山歌社”·····	伍雍谊(466)
溥仪的“宫内府	
乐队”·····	吕金藻 冯伯阳(470)
我的舞蹈生涯·····	戴爱莲(476)
舞蹈艺术伴我一生·····	康巴尔汗(484)

(四)戏剧·电影

谭门艺语·····	谭元寿(494)
孙菊仙的表演艺术及其他·····	许姬传(503)
回忆杨小楼的演出·····	刘曾复(507)
喜(富)连成科班的始末·····	叶龙章(513)
我所了解的盖叫天·····	沈祖安(521)
我与金少山·····	翁偶虹(525)
余叔岩生平回忆片断·····	陈维麟(534)
学戏和演戏·····	侯喜瑞(539)
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	梅兰芳(555)
梅兰芳游俄记·····	梅兰芳(564)

忆麒派创始人周信芳·····	吴石坚(577)
怀念父亲言菊朋·····	言慧珠(581)
一代名琴杨宝忠·····	白宝华(584)
荀慧生传略·····	张伟君(589)
尚小云事略·····	马少波(603)
四十年的艺术道路·····	奚啸伯(613)
马连良与马派·····	迟金声(620)
追忆砚秋·····	果素瑛(628)
我与程砚秋·····	翁偶虹(644)
杨宝森其艺其人·····	杨晓雄(651)
我是怎样演武松与关羽的·····	李万春(655)
我的昆曲艺术生活·····	韩世昌(669)
一生爱好是昆曲·····	俞振飞(692)
回忆母亲白玉霜·····	李再雯(699)
幼年学艺记·····	新风霞(706)
从艺五十年的经历和见闻·····	孙芸竹(715)
戏曲艺术家李桂云·····	王登山(729)
情系舞台·····	陈素真(743)
严凤英小传·····	王冠亚(764)
漫长的越剧革新之路·····	袁雪芬(769)
终生的追求·····	丁是娥(774)
艺海甘苦记·····	周柏春(781)
漫谈皮影戏·····	郝可轩(784)
我的自传·····	侯宝林(790)
京津相声演员谱系·····	马三立(831)
北方评书杂记·····	张枢润(837)
在鼓王刘宝全身边的日子·····	苏茂贤(847)
我的父亲欧阳予倩·····	欧阳敬如(852)
话剧运动的先行官——	
洪深·····	马彦祥(859)
做多头燃烧的蜡烛·····	颜一烟(868)
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	何秀君(875)
怀念应云卫·····	阳翰笙(901)
电影艺术家蔡楚生·····	陈景明(903)
忆司徒慧敏·····	司徒濂 关辉(907)
艺坛生活漫忆·····	王人美(913)
通向银幕的路·····	谢 添(922)
上海早期的三家影片公司·····	陆若严(927)

忆联华影片公司·····	孙 瑜(930)
广州早期的电影制片业·····	刘锦涛(939)
我所知道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 中央电影摄影场·····	陈兰荪(942)
从“满映”到东影·····	张辛实(949)
三四十年代新疆的电影业·····	李 富(959)

(五) 杂技·魔术

坎坷的杂技生涯·····	史德俊(965)
魔术师周化一·····	张玉文等(973)
中国魔术纵横谈·····	曾国珍(979)

忆联华影片公司·····	孙 瑜(930)
广州早期的电影制片业·····	刘锦涛(939)
我所知道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 中央电影摄影场·····	陈兰荪(942)
从“满映”到东影·····	张辛实(949)
三四十年代新疆的电影业·····	李 富(959)

(五) 杂技·魔术

坎坷的杂技生涯·····	史德俊(965)
魔术师周化一·····	张玉文等(973)
中国魔术纵横谈·····	曾国珍(979)

(一) 文 学

记林琴南的几件事

吴家琮

林琴南，福州人，1852年生。30岁中举人，时名群玉，福州致用书院、正谊书院所刻他的课艺，即用此名。字琴南，后改名纾，又号畏庐。尚有笔名冷红生、补柳翁、春觉斋主人、望瀛楼主人、烟云楼主人、践卓翁、蠡叟等。

林于20岁左右，便在福州以教读为生，嗣后主讲福州苍霞精舍、杭州东文精舍，北京金台书院、五城学堂、顺天中学堂、北京高等实业学堂、北京大学堂、闽学堂、箴宜女学堂、正志学校、励志学校、孔教大学校等，最后（约在民国七八年）在京开文学讲习会，先后将近50年，据其自述，他的学生有千余人之多。梁鸿志、黄浚都是他任教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梁、黄同于宣统元年肄业北京大学）。但梁鸿志、黄浚早已背师，梁号无畏，黄号非庐，分割林之名字为二，表明与林脱离师生的关系，兼示鄙夷之意。林首译《茶花女》小说，风行全国，名噪一时，梁鸿志思有以挫之，恃其通晓法文，重行移译，大言不惭，夸称远胜林译，林笑置不较。

林翻译欧美日本小说，凡150余种。他不谙外文，是由王寿昌、曾宗巩、魏瀚、严培南、严璩、李世中、王庆通、王庆骥、力树藩、林凯、林驹、廖珣琨、陈器、叶于沅（以上均福州人）、魏易、陈家麟、毛文钟、胡朝梁等人口述，而转译成书的。以上各人并都通晓国文，尤其是王寿昌、曾宗巩、魏瀚、胡朝梁之辈造诣较深。林译成书后，都经他们寓目，一句未安，多反复斟酌修改，所以很少有扞格不达的毛病。当时胡适赞为：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未有林纾这样大的成绩。

1902年，陈璧为顺天府尹的第二年，奏请设立五城中学堂，以工部主事沈瑜庆为监督，刑部主事卓孝复、户部主事李毓芬为提调（均福州人），并设汉文、西文总教习两席。该学堂为北京首创的中学，朝野瞩目，所以对总教习的人选，相当慎重。陈璧保举琴南为国文总教习（西文总教习为王劭廉，天津人，留英学生），其保举林的奏折云：福建省举人候选教谕林纾，学优品粹，守正不阿，于中外政治学术，皆能贯彻，在福州主讲苍霞精舍，在杭州主讲东文精舍多年，力辟邪说，感化尤多等语。林与五城学堂相终始，连续任总教习，计15年之久。

清季，福建人在北京身居尚书、侍郎、御史、翰林等职者不下20余人，为了便利他们子弟就学，于1907年公议援照四川人创办蜀学堂成例，设立闽学堂，择宣武门福建会馆为校舍，首任监督为江春霖（字杏村，莆田人，御史）。琴南兼任国文教习，每星期授课四小时，讲课时操福州方言，朗诵古文，手舞足蹈，声震屋瓦。有一次讲授韩愈《祭十二郎》文，他以凄楚哀抑的声调，朗读头一句“呜呼，余少孤”五个字，其声呜咽，似闻啜泣。学生中有身世

之感者，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此事轰动全校师生工友。讲解这五字，费了一小时还没有收束，连上四堂才讲完这一篇。他讲解古文，极注重音调，每一篇中句读长短伸缩，抑扬顿挫，无不反复朗读，常令学生依他的音调，朗读多遍。并说好文章如朗诵得法，间以丝竹，其合拍悦耳的程度，与名伶所唱的好戏，并无二致。还说，只有操福州音，才能读得淋漓痛快，丝丝入扣。我叔父洁诚，时为闽学堂监学，为我言之如此。

林琴南曾作闽中乐府 30 首，对腐政陋习，有所针砭，尤其是《水无情》（痛溺女）、《生鬻骸》（伤鸦片之害）、《小脚妇》（喻缠足之弊）、《兴女学》（赞新举）等篇，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影响。该乐府发行不久，便不胫而走，风行东南各省。后一年戊戌，旅居新加坡的侨胞邱炜萋见而爱之，特出资翻印千余册流传南洋一带。庚子八国联军侵略我国之后，林应招赴京任教，目睹京华残破荒凉，疮痍遍地，心中萦纡郁闷，可以概见。更加权奸巨蠹，暴戾恣肆，卖官鬻爵，有加无已，因而，也知朝局非改弦更张不可。所以武汉义旗一举，他浮露了一点乐观情绪，打算换上洋装，作共和国老民，对新政也表了一点姿态。时林任北京大学教习、五城学堂总教习，前一年还任旅京闽学堂教习。我父亲名畲芬，前一年也任过五城学堂、闽学堂教习，与林很相得。辛亥革命时，我父亲由北京回福州，将福州光复后的情况写信告他，以下即是林给我父亲的三封复信。

一、“（上略）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而慕、涛（载慕、载涛）二邸图死灰之燃，合蒙古诸王咆哮于御前，以震慑孤儿寡妇，滋可悲也！项城（指袁世凯）似有成算，重兵在握，已与孙中山密电往来，大抵亲贵群诺，共和立成，亲贵反对，共和亦成，不过在此数日中耳。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国老民足矣！然德宗果不为武后所害，立宪早成，天下亦不糜烂至此。罪大恶极者为那拉氏，次则奕劻，又次则载泽，又次则载澧三兄弟及溥伦，万不可加以赦令也。弟早晚亦赴上海，以卖文卖画为生，度此余年，余则教吾数子，为共和国守法之国民足矣！”

二、“（上略）阳历已更，闽中已过花朝时候，妇女如春游，西国原亦有之，不足怪也，惟旗界如此萧条，想亦天道好还耳。当多尔衮、鳌拜当国之时，旗族杀我汉人，指不胜屈，书生畏祸，不敢有私家纪载，所以凶残之状，但得诸故老传闻，今日得此现状，只得归诸天道循环，微微太息而已！仆所望吾乡同胞，第一节以和衷不闹党派为上着。弊政已除，新政伊始，能兴实业则财源不涸，能振军旅则外侮不生，能广教育则人材辈出。此三事为纾日夜祷天，所求其必遂者也！淫祠尽除，此举尤妙，南台（按：指福州南台地方）五瘟之祀，尚宜一一铲除，方免愚民迷信。此间自逊位诏下，一带报馆各张白帜，大书革命成功万岁，见者欢呼，此亦足见人心之向背矣。项城用张镇芳为北洋大臣，绅民哗然逐之，项城不可，仍是专制。以杨以德为警道，此人由车守出身，一味与民军寻仇，炸弹数轰，乃拥兵自卫，项城亦听其所为，深为不解。近日快意之事，惟彭烈士席儒（家珍）轰死良弼一节，最有关系。良弼以计死吴绶卿，天下指目，而绶卿并无恤典，众疑项城所为，实则良弼为之。不图博浪一轰，涛铁胆落，刻同善耆、溥伟同逃沈阳。闻与赵次山将有诡谋，实则马贼不过六千，未必即能有为。闻新政府将立于南京，刻尚未有动静，大抵数日内，定有明文。弟四海为家，久不作首丘之想，且自问无能，并无所补于新政，亦不敢有求于吾乡诸君子。纵使省界深严，不能容我，然卖文卖画，亦足自给。他乡之人，或不至以一老画师占彼利益，遽下逐客之令也。刻在西开卖画，所得可百余金，亦大奇事。新正当易洋装，于衣服较便，日来得诗七十余首，

姑录数首呈政，勿晒！勿晒！”

三、“（上略）严几道（按：即严复）为大学堂总监督，再三留弟不放，且五城亦将续办，如此每星期须一进京，约留三日出京。大小儿在大城官声尚好，乃作诗赐之，勸彼将来。后来新政府能听其留任，此亦甚好之处。即不然，弟令其在京开小饭馆，自糊其口，亦无不可。共和世界，无贵无贱，即着犊鼻裤，宁便下流耶？”

琴南在旅津的短短时间里，还留诗70余首，现录有关时事的3首，亦可见其思想状态的一斑：

过那桐故宅（按：那桐系清户部侍郎）

乱前经此见园林，道路争知相国心。名位出人先媚外，苍黄定计首埋金。压班冠履容何肃，责效身家口已喑。纵入新朝宁俊物，况无学问作华歆。

读廿五日逊位诏书

数行诏墨息南兵，毕竟收场胜晚明。终赖东朝持大体，弗争闰位恋虚名。伏戎颇已清三辅，定鼎还劳酌二京。最是故宫重过处，斜阳衰柳不胜情。

见津门大街各报馆高张大革命白帜、书

革命成功万岁，见者皆欢呼，归途感赋。

此局明明肇孝钦，卅年府怨士民深。纷奢有过秦人暴，屠胁无难汉族沉。纵未改元署光宅，居然漏网免河阴。今朝父老欢呼竟，鼎革仍原上帝心。

他在后来的另一首感时诗中表现了一种绝望的心理：

此心望治几成灰，时变纷乘胆欲摧。横议直非常理喻，边氛谁悟切身灾。国先难问遽言党，意果能公转胜才。锢疾日深医又误，唐衢泪眼向谁开？

琴南是光绪壬午（1882年）举人，是科主考为宗室宝廷。宝廷与陈宝琛同属清流派，交情甚笃。林与宝廷有知己之感，不只是座主与门生的泛泛关系。并且林的先生、致用书院山长谢章铤。与陈宝琛又是同治乙丑的同科举人，因此林对陈宝琛素以丈人称之，执礼甚恭。每遇陈宝琛夫妇生日及春节之辰，林都行拜跪礼。辛亥革命后，林通过陈宝琛的关系，将他所著的《左传撝华》献给已经退位了的溥仪。陈宝琛又在溥仪面前为林延誉，说他不特长于文学，又善画画。林乃画两把簪子进献溥仪，溥仪赐他“烟云供养”四个字（据陈宝琛说这四个字是溥仪亲书的，但溥仪此时只十一二岁，很少人相信能写这擘窠大字），并出内府所藏的名家字画法帖，恣林观览。林由是感激涕零，以为三公不是过，遂与梁鼎芬辈沆瀣一气。在他70岁时已九谒光绪陵墓，表其忠荃，并说：“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与吾清相终始也。”至此已尽弃前言，俨然十足的清朝遗老了。甚至连老牌的遗老如刘廷琛、郑孝胥辈都深愧不如，讥他逾礼越分，非偶然矣。林纾与段祺瑞的交情原来很好（其侄林绣任陆军部少将科长），民国初年，段祺瑞曾拜访林子北京寓庐，林即席赠诗，有句云：“到门鉴我心如水，谋国怜君鬓渐霜”。迨段祺瑞反对张勳复辟，林则痛骂段祺瑞罪浮于袁贼，直首乱之人。

到了晚年，他的思想日趋保守，是个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在新文化运动掀起时，置身于反对者的行列之中。观其70自寿的诗，真是遗老情调可掬。且择录两首于下：

崇陵九度哭先皇，雪虐风饕梁格庄。百口人争讥越分，一心我但解尊王。世无信史谁公论？死作孤臣亦国殇。留得光宣真士气，任他地老与天荒。

烟云供养御书鲜（少帝御书春条赐臣纾凡三次，烟云供养四字为己未十二月所颁），一道纶音降九天。槁项幸从遗老后，剜心欲献圣人前。惜逢颓运如今日，恨不沙场死壮年。得傍皇居臣愿遂，移家争忍出幽燕。

林琴南平日风趣洒脱，快言快语，不存芥蒂。他曾以诗触忤过林鸿年（字勿村，道光丙申状元）。林鸿年从云南巡抚罢官回籍后，任福州正谊书院第一任山长。该书院为左宗棠督闽时所创办，举人方得人学，体制较其他书院为崇。鸿年恃状元出身，目空一切，考生的试卷稍不称其意，动辄加以墨勒，即录取前列的卷，也不过略施疏点而已。琴南思有以难之。一日问以康熙字典中画有无数圈子，是何意义？鸿年仓卒之间瞠目不能答，因此两林积不相能。有一次月课试帖诗，以“抚孤松而盘桓”命题，琴南所作全首80字的诗，都是借咏松而讽刺鸿年的，记其起首两联是：崛健何曾健，今看五大夫。支离如叟甚，节操笑君无。盖鸿年于太平天国之役以畏葸不前而遭革职也。琴南晚年颇以此举为悔。

琴南撰其母氏事略，初稿有“瘦肉”的字眼。谢叔元（字希安，福州人，癸巳举人）见而哂曰：孰谓琴南通，世有通人而不读水浒乎？不久为琴南所闻，即将“瘦”字改为“精”字，盖“精肉”出自水浒也，并致书谢叔元道谢。

光绪丁酉（1897年）科福建乡试题目为：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有个叫林煦的以抄袭琴南在正谊书院所作的课艺而获中。有一天琴南见及林煦，林煦忸怩不安。但琴南没有表现丝毫德色，反谦逊说：我的旧作肤浅平庸，卑不足道，不图足下赏识至此，拙作赖汝大名而传，岂不荣幸。

琴南与陈衍同登壬午科乡榜，在国内都负有文章盛名。但两人意见不合，常互相抨击。我曾于何振岱（梅叟）处，见琴南致何的一封13纸长函，对陈衍忽称叔伊，忽称石遗老人，忽称诗伯。对陈衍平日言不顾行，多有微辞。但在琴南所印行的诗文集里，不特没有不满的词句，并且还说：余不能为诗，而能诗之友，有郑苏戡（孝胥）、陈伯潜（宝琛）、陈石遗（衍）三人。把陈衍侪于陈宝琛、郑孝胥之列，可谓抬高身价了。陈衍则不然，于其主撰的《福建通志》中为林作传，讥林的画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

琴南在世时，章炳麟痛诋他的文章，有“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等语。迨林逝世，章炳麟为其年谱题辞则曰：“乌乎畏庐，今之蒲留仙（即蒲松龄）也，余博通不如晓岚（即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作者），固不敢为论定，观其谱庶几知其人。”林毕生苦志以继承桐城派正统自期。章比拟他为蒲留仙，恐非林所首肯的。章炳麟惟一继承弟子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同情琴南对旧文学的见解，与蔡元培意见不合而辞职，并向林执弟子礼甚恭。章炳麟对林琴南看法有了改变，说者谓受有黄侃的影响云。

林琴南卒于1924年，终年72岁。墓在福州北关外下凤池（又名白鸽笼），墓亭楹联：“著述倘沾东越传，功名早淡北山文”。系林生前所预撰的。

我的诗和字

柳亚子

关于我学诗的历史，应该先从念诗讲起。好像很小的年纪，最先的一步是念《唐诗三百首》，是在我的母亲费太君膝前或是怀抱中间口授的。在满清乾嘉年间，江南一带，不是有一个大名士叫袁子才吗？这位先生虽然有人攻讦他，说他奔走于公卿权贵之门，人品不高，所以诗品也不高。不过，他倒是有特别的见解的。他不喜欢女子的缠脚，又囿于时代，不敢自己公开来反对，于是在《随园诗话》中间，借了一个大脚才女的口吻，假造出一首诗来：“三寸金莲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缠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这和后来龚定庵的“姬妾古妆不如市，赵女轻盈蹑利屣；侯王宗庙求元妃，徽音岂在纤厥趾”不是一鼻孔出气吗？他反对女子无才是德的传统谬论，而提倡妇女文学，这是难能而可贵的。所以，他的女弟子很多，《湖楼请业图》就成为他的佳话了。这时候，我们吴江黎里有一对文学夫妻，是徐山民、吴子佩，都和他有往来，而子佩便是他的女弟子。子佩的女儿徐丸如，少寡家贫，开门授徒，我母亲在10岁以内，曾从她受业过。所以讲起来，我母亲还是袁子才的三传弟子呢。10岁以后，家中又囿于无才是德的传统见解，不许她读书了。但她对于《唐诗三百首》，却都已念得滚瓜烂熟。这样，便教给了我学诗的第一步门径。

后来，我是正式延师授课了，恰恰碰到了一位陆沅青陆老师，他特别喜欢杜甫的诗，四书五经以外，却教我念起杜诗来，而且要背诵。在当时，当然是很伤脑筋的。但久而久之，对杜诗的趣味渐渐感觉到了。陆老师去后，来了俞文伯俞老师，他虽然有些神经病，给我的影响很坏，但他倒是一个诗人（陆老师只喜欢念杜诗，却没有看见他做过），积稿盈尺，有时候也教我做起旧诗来。虽然他的教授法不高明，不过，我终于向诗的道路上又迈进一步了。

自从12岁移家黎里镇以后（从前是在大胜），父亲自己教了我几年，杜诗已由背诵而改为读一下，终于把这大部头的东西读完了。好像是14岁光景吧，父亲把我送进凌甘伯凌老师的门馆里去，却只每天去两个钟头，多下来的时候，还是在家里读书。在移家以前，好像我已在平平仄仄地写起旧诗来了，自然是不大像样。到了14岁，做得似乎好一些，在上海的小报上，也居然发表起来。这时候，做的都是艳体诗，说甚么义山锦瑟，韩偓香奁。到17岁那年，受了梁任公《新民丛报》诗界革命的洗礼，便把这些东西都付之一炬了。

17岁，进上海爱国学社，想从事革命不成，回来还是做诗。在同里自治学社搅了两年，20岁又进上海健行公学当教员，但革命的目的还是达不到。这时候的革命工作，一部分是武的，暗杀暴动是家常便饭；另外一部分是文的，便是所谓宣传工作了。文学是宣传的利器，诗文并重，效力很大。这样，我的诗不是文学的革命，而是革命的文学了。从健行公学回来很念了一些旧书，史部以外，最喜欢的还是诗，唐朝是李太白、李义山、杜牧之，金元之间是元遗山，明朝是陈卧子、夏存古、顾亭林、黄黎洲、钱牧斋、吴梅村，清朝是王渔洋、朱竹垞、沈归愚、袁子才、黄仲则、舒铁云、王仲瞿、陈文伯、龚定庵，都看了一些，尤其喜欢夏存

古、顾亭林和龚定庵的诗。这样，人家便以为我是龚派了。最古怪的，是对于六朝最著名的《昭明文选》以及宋朝有名的王荆公、苏东坡、黄山谷之类的诗集，却从未看过，至多，不过读读陆放翁、谢皋羽、郑所南诸家的著作罢了。因为这些人都是爱国诗人，使我油然而生敬爱之心，因其人而重其诗。至于讲到诗的派别来，我是主张尊唐抑宋的，同时却也崇拜那非唐非宋的龚定庵。在这个时候，我的诗恐怕已经有了定型了吧。

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夏穗卿、林述庵、林秋叶、吴绶卿、赵伯先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倒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成为诗坛的正统。但我是最反对同光体的，于是和姚鹓雏、朱鸳雏、闻野鹤几个人就在南社内操起同室之戈来，南社也就从此瓦解了。这个时候，为我张目的，有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还有自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的王玄穆，玄穆早逝，又陵先生好像也已很久没有著作发表，于是在南社中间，我和林庚白两人又渐渐成了两大形势了。

我的诗和庚白的诗，来源是不同的。庚白由唐人宋，再由宋人唐。他在同光体中间打过滚的，却能够跳出同光体的圈子，发挥其时与世的理论，更以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入诗。他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我不敢贸然附和，但也并不反对他。我自己呢，庚白死后，从淞妹那里读到了他的全集，觉得受他的影响很深。到现在，我很想做一个丽白楼诗派的继承人。至于所谓正统派的诗人，老实说，都不在我的心上呢。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的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勤劳国事，恐少有著作了吧。这样，收束的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

我是喜欢做旧体诗，不大会做新体诗的。但我的估计，却以为旧体诗的命运，不出50年了。不过，我对于新体诗，实在太陌生，太浅薄，所以，虽然做了三次，终不能走上新体诗的道路。至于旧体诗，我认为我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大刀标枪，果然不及坦克车、飞机的利害，但对于不会使用坦克车、飞机的人，似乎用大刀标枪来奋斗，也不能认为错误吧。我的蔑视旧体诗而仍然要做旧体诗者，其原因就在于此了。

讲到我的字，那真是糟糕，从小就恶书劣字出名的。除了描红和印格以外，我连法帖都没有临过。老实说，临起来也不会像样的，你的字是你的，我的字是我的，临他有什么用处呢。清党亡命以前，我是连亲戚朋友庆喜吊丧的对联，都是自己起草而请人来代写的。但，自从日本回来，一到南京，胆子渐渐大起来，而且居然也有人来请教。在桂林最后半年中，居然卖字，也居然卖到一点钱，这真是天晓得。并且，我的脾气太急，写字像冲锋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问，也就完蛋，管它写得像样不像样呢。有人说我的字是新柳字，又说有些像龚定庵，照我自己看来，只是扶乩和画符罢了。

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至于字呢，也许自有“嗜好与俗殊咸酸”之士，会来尽情欣赏的吧。

1945年10月16日于重庆沙坪坝津南村

柳亚子在桂林

李白凤

一、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位顽强老诗人

柳亚子先生在写了“公情私谊两愁绝，剩将热泪哭萧红”的诗以后不久，因为香港风云险恶，不能再住下去，便带着夫人郑佩宜到内地来。有人要他到重庆去，他表示拒绝。而当时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先生托人致意，希望亚子先生到桂林去。当时桂林已经成为西南的“文化城”，托任潮（李济深的字）先生的荫庇，还有一些“自由”空气。同时，亚子先生的女公子无垢和我同在桂林一个学校里教书，有这几种原因，亚子先生就毅然携眷到此“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来了。

到了桂林，本打算搬到我们所在的学校去住，然而校长雷震虽然是黄旭初的人，却和陈方面来往较密，亚子先生自然不愿意住到学校。于是，临时在漓江门外租了半幢房子，这半幢房子只有两间，而且四面都用木柱子撑着，一遇到风雨交加的日子，真有些摇摇欲坠之势，因此，亚子先生时常嘲笑它是“一木难支大厦”。

这是一座中国旧式瓦房，院墙早已倒塌，残砖败瓦满地都是，地点也相当偏僻，用不着跑警报——躲飞机。里屋是亚子先生和夫人的寝室，家具相当简陋；外间也很阴暗，具备着中国旧式房子堂屋的一切特点。纸窗是用一根竹竿撑起来的，靠着窗，放着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两把椅子。这就是一代诗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亚子先生的书室、会客厅兼饭厅。

刚从香港回到内地，虽然住处简陋，然而总算到了战时的后方，而且总不断有文艺界的朋友来看他——邵荃麟和他的妻子葛琴就住在附近，田汉虽然住在漓江对岸的七星岩下，却三天两头从花桥跑来，因此，亚子先生的精神却比在香港好得多，长久因脑病而不再来的诗兴，也像春潮似地来了。

就在这间小屋里，亚子先生几乎每天都吟咏不辍，而且，他和朋友们琅琅然谈天下大事的笑声，也很使四邻惊异，生活虽然苦一些，倒是和蛰居香港时迥乎不同了。

二、默祭四·一二烈士

有一天，熊佛西先生写信通知我，叫我4月12日那天下午到他家去吃晚饭，据说是给田汉先生做寿。熊佛西也是刚到桂林不久，和叶子（仲寅）一起生活后，就住在离环湖路不远的一座小院子里，院子极为幽僻雅静，似乎就像古代隐士的幽居，因为院里种满了石榴树，所以佛西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榴园”，自然佛西便自号曰榴园主人。可是这榴园里住的却不仅是熊佛西一家，他们贤伉俪住在北屋三间，东屋两间住的是画家尹瘦石，西屋两间住的是王

小涵。小涵是搞戏剧工作的，当时在欧阳予倩先生所主持的广西艺术馆里工作，因为和叶子同事，再加上佛西是戏剧界的前辈，所以小涵一找到房子，听说佛西夫妇尚无处以安“香巢”，便把上房让给他们，自己去住西屋。这几位先生住在一起，每日谈天说地，倒也使得冷静的榴园颇为热闹；自然，这种“书生横议”有时就不免有干时忌，因之，亚子先生要选这样一处颇为僻静而又“百无禁忌”的“寇区”，作为用来纪念四·一二的地点了。

我参加聚会向例是早到的，然而这天田汉先生已经先我一步“光降”了榴园。他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热情而豪爽，谈话每多风趣。不久，端木蕻良陪着亚子先生来了。我当初真以为是替田老大做寿，所以特地刻了一块“寿昌元年”的砖头带来作为贺礼，亚子先生一看，便捋着胡须说：“寿昌是哪一朝的年号？我怎么一时想不起？”等我说出就是田汉先生的“年号”之后（田先生原名寿昌），亚子先生笑得笑不可仰了。

饭就摆在榴园庭中，那时虽然还不到榴花似火的五月，可是十多株石榴也开得相当热闹，夕阳业已西沉，四邻早已炊烟袅袅，黄昏就要降临人间了。入座以后，亚子先生首先站起来，他的面色十分凝静，高举着酒杯，用一种非常持重而异乎寻常的声音说道：“今天，我们在这里喝酒，并不是替什么人做寿，也不是到榴园来吟风弄月，而是为了哀悼四·一二烈士，也就是向蒋介石发出沉默的抗议。”他的两眼炯炯发光，面色微赤，一种凛然的气概充于眉宇。大家经这一说，马上忽地一声都站了起来，举起了酒杯，心里就像压了一大块铅似地沉重。

亚子先生已经说得老泪纵横，局面自然不免有些凝滞，于是，田汉先生提倡联句。

首先由亚子先生起句，端木接承，我坐在端木蕻良的下手，小涵、瘦石末座，第一轮还没有完，亚子先生已经有些着急，索性由他一气呵成，替我们又完了两轮。这种捷才，就连平时惯于对客挥毫的田汉先生也不能不瞠乎其后了。

三、相思江畔的春游

大约是暮春三月杜鹃花盛开的季节，田汉先生要我和陈迺东去接亚子先生，说是敲了盐务局局长的竹杠，到相思江畔去作“春游”。

在那样一个连“诗人节”也不能够公开举行的暗无天日的时代，我们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这一类的集会要把亚子先生捧出来做“招牌”了，因为不用这种障眼法，会议是根本开不成的。

那天去的人很多，大约总有30多人，我只记得除了亚子、田汉、佛西、叶子、朱荫龙、端木蕻良、安娥、孟超、迺冬和我之外，还有艺术馆的几位同志。

我们去时一共有三辆汽车，亚子先生和田汉、佛西坐小汽车先行，我们这些年轻人同坐的一辆卡车居中，最后一辆卡车载着酒菜和应用的餐具，就是这样一个阵容，一直开向郊外，当时的广西大学所在地的相思江。

相思江确实是一个好去处，那里小溪潺潺，绿荫如画，在山穷水复之际，有一片绝大的荷池，大约有一亩多的面积，池中有一架九曲木桥，桥正中央有一个亭子，这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虽然池塘已是残荷败柳，衰敝不堪，再加上板桥和小亭的红漆早已剥落，然而却也有有一种难得的幽趣，这真不愧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风物。据说背面就是当年永历二次入桂的行宫，有名的相思洞就在这土山下面。

到了目的地，广西大学派来一位白发萧萧的庄老先生在大门口恭迎。这位庄老先生是西

大中文系的教授，据说还兼任着什么“长”的职务；然而我只顾和几位年轻朋友去看风景，竟连这位权宜的主人的面貌也没有看清楚。

开始时，记得是田汉先生致辞，因为这次聚会的地方不同于榴园，可以开门见山地、毫无隐讳地说话，这是在一座“学府”里，面前还有一位主人。虽然不是假日，学生还在上课，然而这一群人却轰动了整个西大，因之，围着湖边远远地站满了不少“观光”的学生。

田汉的话说得很隐讳，他大致说：某些人整天嘴里喊“抗战”，实际是不等日本人露面就逃之夭夭，同时，却诬蔑一些在枪林弹雨中浴血抗战的人是“光宣传，不抗战”；现在证明是谁在真正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野蛮侵略，是谁在表面上喊抗战而骨子里力求谋和……今天，北方某处的大捷，就是用事实来答复和唤醒人民的认识……我们今天借了这些人喝不完的酒来庆祝胜利，来庆祝北方坚持抗战，真正在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的大捷……封锁新闻也阻止不了消息的传来，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庆祝这种胜利……。亚子先生虽然很爱饮酒，但是他的酒量并不大，而且欢喜闹酒，所以郑夫人只允许他喝葡萄酒；这时，他也站了起来，一手推开了田汉，一手高举酒杯，大声地喊着说：“我是红党，你们喝白酒的是白党，你们和红党斗争，终归是要失败的。”接着，他又高喊：“毛泽东万岁”。

这样喝了一阵，忽然有人说马君武的坟墓在这里。马君武当年曾经是南社中人，亚子先生过去一向是以“老弟”视之的；但是他后来回到广西，就和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系上了，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关系当上了广西大学的校长，因此，亚子先生后来很看不起他，所以不愿意到他的坟上去。然而，酒确实喝了不少，大家似乎也有些意兴阑珊，便怂恿亚子先生前往，同时顺便去看看“相思洞”。

亚子先生是研究南明史的人，他颇了然于永历荒朝的一些弊政，他说：“那有什么看场？当国土不存半壁的时候，南明荒朝的君臣还在那里闹不团结，制造内部纠纷；甚至把许多良家妇女掳进宫去蹂躏，不顺心的就被丢到相思洞——实际是水牢里弄死。”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杖在地上拄着，好像是要狠狠地鞭挞永历君臣似的——当时正是抗战最艰巨的阶段，亚子先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不起大家劝说，他毕竟也在众人簇拥中前去了。

相思江两岸开遍了杜鹃花，群众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得当的名字叫做“映山红”，四面的群山开成了一片红霞，简直连人们的心都“映红”了。

相思洞附近种了不少相思树，这些不知是前朝哪位附庸风雅的人干的事。总之，似乎绝非南明遗物，这种树像槐树似的生满了羽状叶，据说开的花形式也和槐花差不多，树上结满了成串的、颇似槐荚的相思荚，荚里就是王维所咏“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相思子。我们几个年轻人也不管什么洞不洞，都纷纷地去采撷相思子；我更喜欢这种玩意儿，因而直到两个衣袋都装得满满的才肯罢手。这种相思子有两类，一类是扁型全红的，一类是黑白兼半的，我在20年中分赠给不少朋友，直到今天还留了些给我的女儿。

这天当然免不了作诗，亚子先生更是诗兴大发，可惜我当时只急于去摘相思子，没有抄一份留下来，只记得“老夫耄矣犹堪霸，儿女英雄领一军”这两句。

最后到了马君武坟前，看来，亚子先生本不想说什么，不知道是谁采了一束杜鹃花放到坟前，这样一来就触怒了亚子先生，他突然怒气冲冲地奔上前去，用手杖把杜鹃花打得零落满地；佛西和田汉怕再闹下去不好看，赶快把他劝开。

四、大 国 旗 游 行

长沙大火以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衡阳保卫战。衡阳守城的方先觉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可是外围的薛岳部队和他不合作。大后方群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桂林各界在李任老主持之下，组织了“国旗大游行”。

组织的办法是先商订游行及募捐办法，并同时决定了游行路线，然后由桂林的“五老”（李济深、柳亚子、封祝祺等五位老先生）主持劝募队。本来这事是由熊佛西总其成的，然而事到将成，竟被一个叫滕白也的雕刻家拿去办了。

“五老”参加劝募以后，一般商店和群众捐资非常踊跃，一条马路还没有走完，几丈长的“大国旗”上已经收满了成捆的钞票，20多个强壮的小伙子还抬不动。及至宣传车开到桂南路几家大银行门前，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外的棘手；首先是中央银行不肯捐，广西银行等也不肯出钱。于是只得由“五老”下车亲自去交涉；广西银行因为李任老的关系，只得捏着鼻子捐了5万元，然而，中央银行的经理黄某却非常强硬，表示“没有总行的电报，一文也不捐”。李任老、柳亚老、封祝老等人再三劝喻，他们还是一口咬定不捐分文。这时亚子先生发了火，大骂他们是没有良心的东西，经理黄某是孔祥熙的人，便和亚老顶起来，因而，任潮先生也动了火，拍桌子问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老百姓的钱？”而且表示由“五老”署名给总行去电报，并要他们先捐10万元作为表率。可是那些人因为后台硬，一步也不肯放松，结果李任老真动了气，说他们破坏抗战，要抓人，他们才算勉强捐出了10万元。

当时法币虽然已经贬值，可是募得的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据说如果真的用到抗战方面，倒很能有些用场，然而不知道滕白也怎么三搞两搞地竟没有了下文。这件事情虎头蛇尾地空闹了一阵，接着衡阳失守，方先觉来到桂林。

方先觉一到桂林，各界就组织了欢迎会，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人都到了场；徐悲鸿先生本来是不轻易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的，因为和方先觉是同乡，那天居然也穿了一件灰布袍，里面系了一条宽大的黑绿色的“艺术家的领带”出场了。席间，不知道怎么一来，方先觉要拜亚子先生做“老师”，亚老当时予以拒绝。可是这消息飞快地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去，后来弄得方先觉一到重庆，蒋介石就要把他押起来——本来方先觉是到重庆去领赏的，就因为他钦佩亚子先生，几乎得罪，可见得国民党当局对亚老是如何憎恨忌讳的了。

五、两 次 画 展

我要说的两次画展，都是与亚子先生有关的：一次是尹瘦石的画展，一次是漫画家“牛鼻子”黄尧的画展。

尹瘦石画的多半是大幅历史画和仕女，他筹备这个画展，事先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尤其是亚子先生，他对于瘦石的选题、布局种种方面都参加了意见，因而，这次画展的内容，大部分是有关南明抵抗清兵的历史画，其他一小部分也是提倡民族气节、颂扬正气的题材。自然，这些画幅，亚子先生多半都题了诗，而且有的甚至题两三次，郑成功围攻南京的大画就题了两次。这幅画是相当成功的，郑氏站在海舰上指挥作战，他身上除了金色铠甲之外，还

披了一件猩红色的大披风，颇有一种威风凛凛的气概；这在当时大后方抗日气氛低沉的年代里，确实可以当作强心剂来用。亚子先生的诗中有两句这样的话：“忘机鸥鸟休轻下，恐有人间石季龙。”（编者按：柳亚子《磨剑石诗词集》1005页载有“为瘦石题画”诗：“激浪奔涛趁好风，混茫灏气荡心胸。忘机鸥鸟休轻下，恐有人间石季龙”。）石季龙指的是谁？自然不是郑成功，更不是多尔衮，这种激忿的心情，是贯穿着亚子先生当时全部诗歌生活的。

另外一幅巨大的历史画是伯夷叔齐图，这幅画大约有一丈多长，一切都设计好了，只有夷、齐两人的面型，一时找不到合乎理想的“模特儿”。这样踌躇了很久，有一天，亚子先生忽然自告奋勇要作伯夷的模特儿，并且介绍瘦石采用鲁迅先生的面型做叔齐的画稿——我们都熟知鲁迅和亚子两位先生之间的关系，那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当年写成后，第一个赠予的正是亚子先生。

另外一个画展，却是以画漫画《牛鼻子》出名的黄尧展出的。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人，或许记得抗日战争以前，在全国各大报章杂志上与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叶浅予的《王先生》一起驰名的《牛鼻子》，那就是黄尧的作品。

画展的内容完全是梅花。我当时很不赞成这个画展，理由是：第一、黄尧不是国画家，画梅花不是他本色当行的事；第二、那种环境之下开那种画展，不合乎时代需要。可是，亚子先生认为抗战时期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只要与抗战有利的事就支持；当时是人欲横流的大黑暗时代，贿赂公行，上下交征利的歪风盛行，“梅花”的冰清玉洁，正是与这种风气抗衡的一种象征。亚子题的诗自然是按照这个意思。

在预展时，亚子先生是随画随题——黄尧画一幅，他就题一幅，大约前后题的梅花诗总有百多首，如果这些诗稿还存在，那真是洋洋大观，恐怕要远超前人了。有一天，亚子先生一口气题了12幅之后，大家都劝他休息一下，偏巧这时来了一位《广西日报》的女记者紫凤，她要黄尧给她画一幅红梅。旧社会的新闻记者是所谓“吃十方”的（和尚称为吃十方，新闻记者连和尚还要吃，所以人们讽为吃十方）。黄尧平时画的是墨梅，手头没有颜色，有人建议用印泥，但是效果不很好，于是，黄尧就打开紫凤的手提包，拿出一截口红点了梅萼，居然十分鲜艳。画完了，这位女记者又缠着亚子先生题诗，亚子先生不假思索地站了起来，提笔写道：“沉醉葡萄艳玉容，长弘碧血渺难逢；毫端倘有西来意，不买胭脂买口红。”这“西来意”在今天看起来是应该加以注释的，因为当时在欧洲，美英联军开辟第二战场的呼声，已经达到“干打雷不下雨”的程度，而在中国的美国兵却横行霸道，妄作非为，到处调戏妇女，乱抛美国货，于是，胭脂、口红与尼龙丝袜飞满了天，亚子先生的愤慨是有对象的。

六、月牙山豆腐与太虚法师

久游桂林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三宝”，就是荸荠、马肉米粉和天一斋腐乳，然而我还是欢喜“三宝”之外的月牙山豆腐。

我曾经一度有缘借住在桂林功德林里读书和刻图章，略知一些和尚的生活情况。单说月牙山的豆腐便不简单，烧一锅豆腐真比大观园里的一盘菜不少逊色，只是所用打底子的一项“金钱菇”，就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正说明禅门之中生活的一面。

自从月牙山老住持圆寂以后，庙里的大厨师便被一个广东盐商李某请到他私人的公馆里

去，因而，知道内幕的人，大半都不到月牙山去领略豆腐的风味，反而改到李某家里去作客了。

旧社会的商人和官吏一样，有了两文钱便想附庸风雅。李某自然并不例外，他既然有了一位好厨师，怎肯不思以炫耀于众呢？当时桂林文酒之风很盛，许多酒楼在开张的时候，都要邀请文化界的人去吃一顿。这时，多半以亚子先生作为团体的中心人物，而嘉陵江川菜馆甚至还由亚子先生主持了一次诗钟和诗谜活动，很热闹了一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李某因为和黄尧是老相识，听说黄尧的画展亚老很帮忙，于是，就通过黄尧，请亚子先生代邀几位朋友到他家里去尝一尝豆腐。

他家里的厨师既然是“名冠当时”，亚子先生就答应这次邀请，并且借着这个机会过江，畅游七星岩。那天同游的记得有田汉、熊佛西、端木蕻良等十多个人。天一亮，我就赶到亚子先生家去，不多一会儿，端木蕻良也来了，我们就陪着亚子先生过江，到花桥去找田老大。

沿着澄碧清澈的滴水，我们先去看“党人碑”，这是后人继作的“摩崖”，上面镌着北宋当时被目为“党人”的名字。自然，由于子孙的作伪，其间也夹杂了几个本非列名是碑的人的姓名，而且原碑已毁，这“摩崖”又是后刻，所以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兴趣，只是边游览边听亚子先生讲述北宋当时“党争”的遗祸。

看过“党人碑”，顺便就到了月牙山。循着曲折的山路，一面眺望江山秀色，一面对月牙山的掌故，不多时就进了山门。这时，正是当时的大和尚太虚法师在桂林宣讲佛法，因而月牙山香火之盛，可谓空前。太虚跟当局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拜入座下皈依的达官贵人，真如过江之鲫，据说谒见的费用颇为可观。

我们在庙里浏览了一下，觉得挤在这十丈红尘的人堆里颇为气闷，都想早些离开，亚子先生一向是讨厌这种场面的，他自然更加急于离开这里到山顶上去透一口气；太虚听说亚老来游山，便派人来请亚老去“随喜”。亚老心里不高兴，嘴里连连地说：“我去做什么？”就丢下众人，大踏步地冲向山门。说来也巧得很，这时李任潮先生也来游山，碰见亚子先生正出山门，就迎住他谈了几句话，并且约他到寺里去坐一坐，亚子先生只匆匆地和他告别，就带着一群男男女女直向山下走去。

遇到这种扫兴的事，大家自然都不再想游山，于是黄尧提议到李某家去，虽然离约定的时间是还早一些，但大家都觉得与其在山里乱闯，倒不如早些去打扰那位主人。

这座公馆是建筑在半山里的，三间客堂面临滴水，下面就是数十丈悬崖。屋子里布置得很清雅，陈设也颇简单，竹桌竹椅另是一种风味。我们到时主人还没有回来，大约是去买东西了。黄尧是常客，开门的司阍者正是那位有名的厨师，经黄尧介绍后，大家就到客厅里坐下来闲谈。

亚子先生一反故常地沉默不语，即使有人和他谈话，他回答得也很简单，总之，我们都看出他今天的游兴并不好，情绪也很坏，话多了他会发脾气，所以也就三三两两地去聊天。三点半钟打过以后，主人回家了，这位商人身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袍，头上戴着礼帽，面孔上一片红光，两颊剃得发青，一眼看去就是一种营养很好的象征，动作微有一些粗鲁，一口广东官话；我猜想他是个国民党广东派的军人，大约是“弃官从商”的。

主人来了之后，自然先是喝酒；酒的样数很不少，什么贵州茅台、四川大曲之类摆满了一张桌子，佐酒的都是十分地道的广东腊味，亚子先生仍然喝他的红葡萄酒。